

体系·体例·体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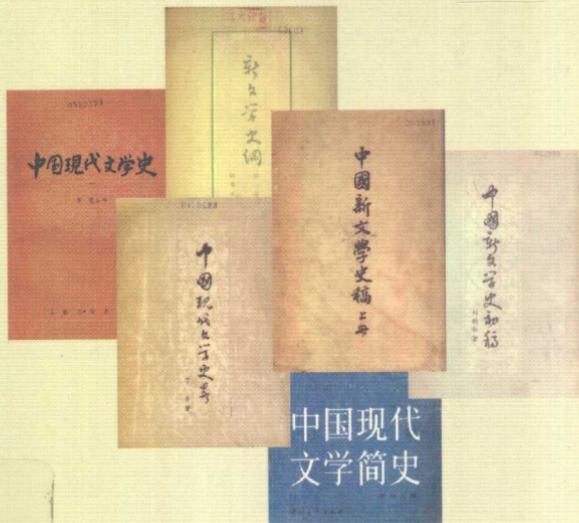
赵雷著

新巢文叢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

曾绍义 / 主编

1949—1984年
中国现代文学史著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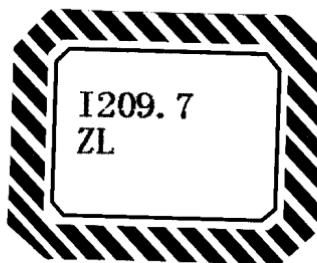
四川大学出版社



体系·体例·体制

1949—1984年中国现代文学史著研究

赵雷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孙滨蓉
责任校对:曾 鑫
封面设计:罗 光
责任印制:杨丽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体系·体例·体制 1949-1984年中国现代文学史著研究 / 赵雷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5.3
ISBN 7-5614-3042-6

I. 体... II. 赵... III. 现代文学 - 文学史 - 研究
- 中国 IV. 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9723 号

书名 体系·体例·体制 1949-1984年中国现代文学史著研究

作者 赵雷著
出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印刷 四川大学印刷厂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11.75
字数 288 千字
版次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1 000 册
定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电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 ◆网址:www.scupress.com.cn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新巢文丛》总序

曾绍义

这是一套对现代中国文学进行专题研究的学术丛书，每个专题一本，从詹庆生同志的《冰火重天——现代性问题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代际冲突》开始陆续出版，即将面世的计有赵雷同志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学问题研究、游翠萍同志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女性革命者形象研究、廖久明同志关于作家高长虹的“冤案”研究、王玉春同志关于现代中国女性散文的研究、韩梓坤同志关于张爱玲小说研究的研究、刘海洲同志关于四川现代作家创作史的研究、周涵维同志关于中国现代女作家散文的研究、康鑫同志关于曹禺创作史的研究等成果……

研究对象之所以确定为“现代中国文学”而不局限于“中国现代文学”，原因只有一个，这就是：只有将学科建设置于“现代国家”的观念中进行长远、全面、宏观的规划与实践，其结果才可能是真正科学的，合乎事物本来面目的，而不再显出片面、浮浅与捉襟见肘。无

论将“现代中国”的出现定于何时，因从国家观念出发，发生在“现代中国”里的所有文学现象，便都是“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对象，例如“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近百年中国文学”、“新文学”、“新时期文学”、“通俗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台港澳文学”、“翻译文学”、“留学生文学”、“旧体诗词”，以及中国文学研究、世界文学研究等等，统统包容其中，即可形成“上可封顶下不封底”，富有生气的、灵活的全新研究格局，这就不仅大大拓展了研究空间，更重要的还在于这种研究才是立体的、系统的、符合历史真相的科学的研究。

丛书之所以取名“新巢”，原因也只有一个：丛书作者都是我指导的硕士研究生，他们大多只有二十多岁，且都有成为“专家”的学术研究潜力，编入本“丛书”的著作又都是他们从事学术研究的“处女作”——在我看来，这完全可以算作是他们初步“成家”搭成的“新巢”。与学术上的那些高楼大厦相比，这些新搭建的窝巢也许显得有些粗糙，但它毕竟已是一个“家”：只要从这里出发，坚持不懈，百折不挠，这些“新巢”的创建者们就一定会耸立起他们自己的高楼大厦，成为学术研究的大家！对此，我深信不疑。

作为丛书主编，除了感谢作者们特别的辛劳与执著（丛书主体内容都是在校期间完成一般硕士生必须完成的学业之余写成的，因此他们往往有假不休、有家不回、有亲不探，即使走上工作岗位后也从未停歇），还应特别感谢詹庆生同志。是他在1998年9月刚入学不久的一次专业学位课的作业里，从现代性现象谈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设想，引起了我的注意，并使我逐渐产生了主编一套全由我带出的硕士生撰写的学术研究丛书的愿

望。

总之，“新巢”的主人们让我十分欣慰地看到了浩浩学海涌起的又一股学术新潮！“新巢”既是已有收获的象征，又是继续前行的起点，更是一种激励与催促。衷心祝愿“新巢文丛”的年轻作者们奋进不息，不断取得新的研究成果；也恳切祈盼前辈学者能对本丛书提出宝贵的批评。

特别的推荐（代序）

曾绍义

这本史著研究是《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新巢文丛》面世的第二部著作，我虽已在《总序》中就有关问题作了说明，但本书作者赵雷同志既是我十年来指导的硕士研究生中在毕业之前写出研究专著的第一人，据我所知，也是我所在的硕士学位点自1983年开始招生以来所有在读研究生中独立完成课题并出版学术专著的第一人，而且今年才24岁——此种情形许是在全国范围内亦不多见。所以，除了向作者的成功与辛劳表示祝贺与感谢外，作为丛书主编，我又不能不怀着特别欣喜的心情写下一份特别的推荐！

首先是作者的学习态度与研究精神值得赞赏。两年多来，赵雷同学一方面认真学习各门学位课程，取得了优良成绩；另一方面投入到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著的研究之中，不分寒暑，舍弃假期，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条件，不仅搜集了较为翔实的资料，又从宏观与微观、综观的结合上，较为深入地探讨了35年间中国现代文学治史的特点及得失，总结了其中的若干规律，为更好地写出现代中国文学史著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对于一个二十来岁的在校学生说来，这项研究的难度无疑是很大的，但赵雷同学不趋时髦，知难而进，刻苦钻研，终获成功；在当今这个容易受利益驱使、人心浮躁的“社会转型期”里，有像赵雷这样甘守寂寞、甘于清贫的年轻学子，确是值得我们感到欣慰的幸事！

其次是作者的文学史观与研究方法值得肯定。1949年—1984年是新中国成立后较为复杂的历史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史

2 体系·体例·体制

的编纂也呈现出复杂情况。赵雷能依据客观事实，既清晰地勾画出从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到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简史》的演变过程，又对其中影响较大的诸如“大师”定位、“经典”确立、“绪论”变迁等问题进行了重点剖析，特别是专辟一章对文学史与教科书“合二而一”所作的深入论述，颇有说服力，从而显示了作者正确的治史观和文学观，也证明了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并通过从“体系”到“体例”再到“体制”的逻辑联系的揭示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它完全符合历史真相。

此外，全书自始至终保持着一个严谨治学者的朴实学风，叙事是朴素的，评判是朴素的，连“后记”文字也写得朴素而深情——或许正是这种朴素的笔调、朴素的风格，与某些后学“新秀”的浮华与喧嚣所形成的强烈反差，使我更加感到我应该为赵雷和他的这本“处女作”特别喝彩了。希望赵雷同学在即将继续深造的道路上步子更稳、出息更大！

2004年12月25日
成都川大花园南区

前　　言

本书选择 1949 年—1984 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几个原因：第一，对学科尤其是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而言，20 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和七八十年代之交是两个重要的发展阶段。随着新中国的建立，现代文学从古代文学中脱离而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王瑶、丁易、刘绶松等学界前辈筚路蓝缕，以《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为代表的最初一批著述为现代文学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了最基本的历史框架、叙述思路和专业话语；而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坎坷曲折之后，随着新时期的到来，学科重新焕发生机，各种新方法、新观点层出不穷，不仅在一段时间内形成了现代文学史编写、出版的热潮，更重要的是，以《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为代表的著述的出现，标志着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和书写在续接传统的同时开始有了创新和突破。第二，从社会环境来看，这两个时期具有很大的相似性，都是充满自信和希望的青春的时代，获得解放的喜悦和开创历史的雄心是当时普遍的社会心理。在这两个时期，乐观主义心理氛围和直线进化论的历史思想决定着人们的思想、情感和信仰，也影响着现代文学的历史书写。不仅王瑶等人开创的个人书写的文学史传统在新时期得以延续，更重要的是二者所共同具有的支撑文学史书写的“进步”的历史观念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研究者们相信自己可以也应该揭示历史的真实，“还原现代文学史的本来面目”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第三，这两个时期

中，现代文学学科都受到了极大的重视，一度成为社会的焦点，其关注时代、参与现实的地位和功用都得到了极大彰显：前一个时期是被用以证明胜利者胜利的合理与必然，从而参与新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后者则立足于批判曾经的曲折错误，为新的历史时期摇旗呐喊。因此，诸多的共同点促使我选择了这一时段的现代文学史著述作为研究对象。

本书主要从体系、体例、体制三方面探讨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所谓体系，就是学科的知识体系，包括总体构架、历史线索、作家作品以及由此形成的话语系统。随着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形势和社会、文化的齐转与一元化，新文学史（现代文学史）成为新的学术规范，对百年历史的条块分割也经由教育、宣传机制而得以推广和强化，尤其经过新的教育体制的建立和规范，成为体系化的知识以至常识予以传播。今天，任何一个人都知道“鲁郭茅巴老曹”，阿Q、骆驼祥子、蘩漪、觉新的形象也深入人心，现代文学已经借助传播、教育等诸多渠道成为人们日常经验的一部分。以学科史的眼光来看，这样一套知识也经历了一个逐步体系化和经典化的过程，即使其中一些已成为常识的东西也有从提出到完善的过程，并不是不证自明和理所当然的。我所关注的是学科的这一套知识体系的形成及其变迁的过程。现代文学的知识来源除了学科自身的传承发展，还包括对其他领域的引入借鉴。学科正是在这样的传承、积累和创新中逐步发展和建构起独立的知识架构和话语体系的。因此，我以文学史著中的“六大家”和绪论为对象，从评语和定位、篇幅与章节以及代表作品的选择等方面，回顾了自《中国新文学史稿》起文学史家对“六大家”的选择和塑造过程。同时，绪论作为著述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中对于现代文学史的定性、分期、渊源和基础、历史线索、文学论争等的论述，也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学科建设的进展和变化。而以《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为代表的诸多著述也均对

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学史著述对它们的借鉴是从研究思路、知识系统以至表述方式的全方位的，因此，要探讨学科的知识形成，它们也是不可忽视的内容。

体例，也就是文学史著述的谋篇布局和叙述方式。史著的体例包括以作家或作品为中心组织叙述，每种体例自身的发展演变过程，作家作品的分析论证模式等内容。这其中既有专著与教科书的区别，也有“史”与“论”的安排、历史概述和作品分析的组合。不同的体例不仅仅是叙述方式的区别，还涉及写作者历史、文学观念的差异，比如文学史是以突出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名家大师为主，还是着力于厚描一个时期的文学创作、阅读的一般环境和普遍水平，体现在文学体例上就是“作家论”与“作品论”的区别。从“三部半”的不拘一格到后来的规范划一，体例的变迁无疑也折射出学科的发展变化。

体制，即现代教育体制和社会环境对文学史研究和写作产生的规范和影响。现代文学史是作为高等学校中文系专业课程而存在的，它就必须适应现代教育制度和学科体系。因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由高等教育建立的学科体系的完善，尤其是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等都会对其发生直接的影响。而教研室（组）的组织形式及教学大纲的制定，对学科的影响更为直接，使文学史的写作从个人著述过渡到集体合作，而写作方式的改变带来的从思维方式到行文风格的全面的变革。总的说来，新中国成立后的现代文学史经历了“个人著述”→“集体写作”→“个人著述”的发展过程。当然，二者各有适应面和优缺点，很难简单地判断其高下优劣：集体著述要求的是稳妥一致，更适应学校的教育教学要求，有利于文学史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传授和学习；而“个人化”更多地带有研究意味，不仅为摆脱“编写组”式的分工合作和由此形成的种种思考和写作的既成规范提供了可能，也标志着在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既成知识体系与理论框架外的探索

与尝试。教学大纲则通过行政机构权威文件的形式规范了文学史的研究思路以至作家作品的选择评价，从而对教学研究产生重大的影响。可以说，教学大纲代表了一个时期内学科研究所达到的水平，把不同时期的大纲放在一起比较，从中也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学科的历时发展。随着各级各类教育组织、机构的设立，现代文学学科被纳入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统一的教育体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政治形势、社会环境对学科的影响尤为明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治运动，尤其是对知识分子和高等教育的改造，对文学史写作主体的心态和思想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对文学史而言，无论具体时段的划分还是知识体系的构筑，任何一位研究者或一种结论的背后都必然存在着一定的文学史观念。在这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研究关注颇多。不仅几乎每一部文学史著都设“绪论”专门论述文学史的性质、任务、方法等问题，在各专业刊物上发表的著述评论、理论争鸣的文章，也全方位地涉及了文学史的定性、分期、体例以至对作家作品的选择、评价标准等诸多问题。新时期以来，学科理论建设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对国外研究方法、思路、成果的引入和借鉴，以及学术界的关注和探讨，使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和细化。

文学史既属于文学学科，也属于历史学范畴。文学史家如果不掌握第一手材料，写来写去就是重复那么几条尽人皆知的“陈货”，就难有新的发现和深刻独到的认识，也不会有包含开创性和真知灼见的史著问世，其结果是把文学史写成人云亦云、千书一面的复制品。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各集导言之所以成为经典，作者的学识固然重要，大量原始资料的积累和运用无疑也是其详实有深度的重要原因，使之能从中得出人所未见的新论与评述，因此足以标志一个时期的研究水平，对后人也有启

发和教育作用。文学史也许不像考古学、人类学那样极大地依赖田野工作，但不仅被埋没的历史文献要靠研究者的慧眼去发现，面对历史遗留的众多文献资料，没有经过一番鉴别考评，也谈不上好好利用。因此，学科的史料搜集与整理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自《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起，史料工作就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新文学史料建设逐渐进入正规化轨道，尤其新时期以来大规模的现代文学辞典和丛书、汇编等的出版，为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现代文学学科已走过了数十载风雨历程，其中每一步都饱含学人的心血和汗水。以研究队伍和课题成果而言，它已成为当今中国汉语言文学诸学科中的一门“显学”。书写历史，其实就是在认识和完善我们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否定和检讨是痛苦而又必须的。新的理论学说和研究成果只能来自对旧知识的批判与选择。文学史学科只有在不断的质疑、挑战、激活、创新中才能获取不竭的发展动力，使之既能在对过去的研究中自我更新，又可以保持对现时文学、思想状况的敏锐反应和应有热忱，而不会僵化、变质为单纯的条条款款。总结过去是为了面向未来。在开拓创新的同时回顾历史，对研究主体、方法和成果保持清醒和审视的态度，才是学科走向成熟的希望所在。

目 录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新巢文丛》总序 ······	曾绍义 (1)
特别的推荐 (代序) ······	曾绍义 (1)
前 言 ······	(1)
第一章 知识体系的形成与建构	
第一节 “六大家”的形成——评语和定位 ······	(1)
第二节 “六大家”的形成——篇幅与章节 ······	(15)
第三节 生平、思想、创作——作家论三部曲 ······	(20)
第四节 入史资格——升迁与沉浮 ······	(27)
丁玲 (29) ——蒋光慈 (33) ——瞿秋白 (37)	
第五节 入史资格——隐去与归来 ······	(39)
沈从文 (40) ——张恨水 (44) ——钱钟书 (47)	
第六节 “大师”的形成——以赵树理为例 ······	(48)
第七节 “经典”的确立 ······	(54)
标准：政治与艺术 (55) ——“六大家”代表作 (58)	
第八节 “经典”的解读 ······	(76)
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作品分析二分法 (76) ——两种 分析范式 (84)	
第二章 “绪论”研究与内容拓展	
第一节 “绪论”的形式及变迁 ······	(90)
第二节 绪论内容——定性 ······	(97)
第三节 绪论内容——分期 ······	(110)
第四节 绪论内容——渊源与基础 ······	(123)

第五节 绪论内容——历史线索	(128)
第六节 分类与演变：历史叙述中的文学论争	(135)
第七节 内容的拓展	(148)
群众文艺 (149) ——少数民族文学 (154) ——电影 (161)	
——近代文学 (旧民主主义文学) (165) ——变动背后 (170)	
第三章 文学史的传承与借鉴	
第一节 知识积累——《中国新文学大系 (1917—1927)》	
.....	(173)
对作家作品的选择收录 (173) ——各集“导言”的历史叙述 (178)	
第二节 知识积累——其他史著	(183)
《中国新文学史研究》 (183) ——《中国新文学史讲话》	
(184) ——《苏联文学史》 (185) ——《十九世纪文学主流》 (188) ——《中国现代小说史》 (190)	
第三节 史料的搜集和整理	(193)
第四章 文学史理论研究	
第一节 “文革”前的理论建设	(206)
第二节 新时期的理论建设	(210)
第三节 史著评论中的理论争鸣	(214)
关于《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讨论 (214) ——对《史纲》	
《史略》和《初稿》的评价 (221) ——“唐弢本”	
(224) ——“九院校本” (226)	
第四节 理论探讨	(228)
文学史分期 (228) ——如何开创研究新局面 (236)	
第五节 学科之外	(243)
作家评论和历史描述 (244) ——第一次文代会：历史总结与	
作家定位 (251) ——《新文学选集》丛书 (257) ——《人民	
文艺丛书》 (260) ——《新民主主义论》 (267)	
第六节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272)
第五章 “体制”下的研究与写作——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	
第一节 教学大纲	(288)

从开始到成熟 (288) ——两个教学大纲的比较 (291)
——关于《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的讨论 (295)
——其他教学大纲 (298)
第二节 文学史著的教科书身份 (301)
文学史与教学 (301) ——文学史的写作 (304)
第三节 著述体例——专著与教科书 (314)
“史”与“论”的安排 (314) ——历史概述与作品分析 (317)
第四节 体例类型及其发展 (324)
作品论 (324) ——史论分体 (326) ——作家论 (327)
综合体例 (329) ——教材体例 (332)
主要参考文献 (339)
附 录 (345)
后 记 (352)

第一章 知识体系的形成与建构

中国现代文学的读者和研究者，对于“鲁郭茅巴老曹”这样的说法并不陌生。在一段时期内，“六大家”的格局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现代文学史的公论以至模式，其影响迄今未绝，以至今天的文学史对“大家”、“经典”的选择评定大多不过在此基础上增减名额而已。这种生命力也从一个侧面证明这一架构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自有其说服力和合理性。按照福柯（Michel Foucault）“知识考古学”的观点，任何一种知识都不是不证自明和理所当然的，那些看似“简单”以至被认为是常识的东西，也有其发生、发展、接受和变迁的过程。全盘否定、颠覆一切的绝对的解构主义立场自有其盲视、偏颇之处，但面对“六大家”这一“后设”的文学史格局，我们有理由发问：它是如何形成的？其间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在变化背后起着主导作用的因素又是什么？要解答这个问题，不能仅从一部著述中寻找答案，而应从多部文学史的比较中历时地回顾知识的形成过程，看文学史的常识与定论是如何被一代代文学史研究者和书写者所构造、累积以至形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体系和面貌的。由此所反映出的将不仅是知识体系的建构与传承，还有不同时期的文学史观念、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的差异与联系。

第一节 “六大家”的形成——评语和定位

作家地位的升迁沉浮，在文学史著中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评